

比较教育学

高如峰 张保庆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比较教育学

高如峰 张保庆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60051

比较教育学

高如峰 张保庆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6.75 印张 4 插页 150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501 4,500

ISBN7-81009-740-7

G·252 定价:8.50 元

前 言

比较教育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形成与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间，世界各国的许多比较教育学家，通过自己长期的艰辛劳动，已为这门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各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 80 年代以后，世界的格局和力量对比虽都在孕育着改变和调整，但决定着全球发展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90 年代作为两个世纪的交汇点，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过渡时期。未来的 21 世纪，将是一个各国之间影响、依存不断加深，相互矛盾、竞争又日益加剧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中，各国所面临的将是一场“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较量的焦点是经济发展的快慢；较量的实质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争夺和科技的竞赛；而知识、人才、科技又都离不开教育这个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许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依靠教育和科技，是振兴经济、振兴民族的必由之路。经验还将继续证明，谁在教育与科技方面走到了前面，谁就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谁具有了教育和科技方面的主动权，谁就可能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谁掌握了 21 世纪的教育与科技，谁就可能掌握这个世纪的主动权。正是看到了教育在现实和未来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各个民族、国家、阶级、政治派别，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改革本国

或本地区的教育,调整教育发展战略,突出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在此背景下,比较教育学既赢得了继续发展的良好机遇,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比较教育学者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亦变得空前艰巨与繁重。

为了使比较教育学在应付当前世界性教育改革调整新潮流及未来世界的各种挑战中,进一步显示出其巨大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力量,我们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整理,写成此书,以期能抛砖引玉,进一步促进比较教育学的繁荣与发展。

本书力图从理论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的科学原理、理论基础、方法论与方法、动向与趋势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概括与论述。但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内容的不成熟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指正。

高如峰 张保庆

1989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历史与发展·····	1
第一章 历史与发展·····	1
第一节 国外比较教育学的历史与发展·····	1
第二节 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历史与发展·····	17
第二部分 科学原理与理论基础·····	28
第二章 定义与界说·····	28
第三章 对象与范围·····	33
第四章 性质与特征·····	38
第五章 功能与任务·····	45
第六章 理论基础与流派·····	54
第一节 借鉴论·····	54
第二节 因素论·····	57
第三节 宏观比较论与微观比较论·····	62
第四节 现代派比较论·····	69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比较论·····	75
第三部分 方法论基础与方法 ·····	86
第七章 方法论基础与方法·····	86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86
第二节 方法论基础·····	89
第三节 基本研究方法·····	92
第四节 其它研究方法·····	94

第五节 对研究方法的回顾与思考·····	132
第四部分 问题、展望与未来·····	141
第八章 问题与偏向·····	141
第一节 应用性与理论性·····	141
第二节 客观与偏见·····	145
第三节 统一性与可比性·····	150
第四节 资料的完整性与可靠性·····	155
第五节 一般性与特殊性·····	157
第六节 现象与本质·····	159
第七节 静与动·····	163
第八节 “我”与“它”·····	165
第九节 “发达”与“发展中”·····	168
第九章 动向与趋势·····	171
第一节 世界比较教育学的动向与趋势·····	171
第二节 中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任务与方向·····	186
第十章 在未来世界中的重要地位·····	195
后记·····	205
人名对照表·····	206
参阅书目·····	208

第一部分 历史与发展

第一章 历史与发展

每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脱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也避免不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必由之路。比较教育学——这门由教育学派生出的现代新学科——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第一节 国外比较教育学的历史与发展

对外国古代比较教育的研究,迄今还很少有人问津,更谈不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工作。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在19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教育学本身还没有形成作为一种成熟的科学体系,由于世界大体上还处在一种闭塞的状况,比较教育学缺乏产生的必要条件,因而也就无从谈及比较教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第二,然而,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必然有着一段不可割断的历史渊源。比较教育学也是如此。事实上,远在19世纪以前,就有不少人士开始以旅行见闻等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

人类带有教育比较性质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古希腊的赫洛多托斯(Herodotus 公元前484—前425)在其有关波斯战争的评论中,就提及了当时波斯的教育

状况。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430—前355)曾专门考察了波斯的教育。在其所著的《波斯国王赛勒斯传记》一书中,更为直接地介绍了波斯对青少年进行公民品质和领导能力的训练与培养的情况,甚至还对希腊和波斯两国的教育结构、培养目标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评价。古罗马政治家西赛罗(Cicero 公元前106—前43)在其《论演说家》一书中,既记叙了当时希腊与罗马的文化教育状况,同时又特别指出希腊在对学雄辩术的训练方面远胜于其他国家。泰西塔斯(Tacitus 55—116)专门著书介绍了犹太人和德意志民族的教育情况。

在中世纪中国教育也被最早受到注意。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对中国进行了游览参观,并在元朝供职17年。在其珍贵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相当多地介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教育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事具有教育比较性质的活动,其中较有成就者当首推突尼斯的伊本·卡尔丹(Ibn Khaldun 1332—1406)和德国的米登多普。前者非常欣赏东方伊斯兰文化与教育的价值,对教育比较的要素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对比较的方法表示了某些见解,并力图从比较中取得一些教训。后者则着重比较分析了法国、丹麦、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

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促进了这类活动的发展。法国的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和伊拉斯莫斯(Erasmus 1469—1536)等人也做过一些颇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后者,曾对当时受到首肯的英格兰教育和意大利教育进行了比较。

1647年瑞典的约翰·洛克森纽斯(Johan Loeccenius)已

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教育历史进行比较。在以后的 100 余年中,英国的威廉·佩蒂(Willian Petty 1623—1687)、法国的拉·夏洛台(La chalotais)、狄德罗(D. Diderot 1713—1784)、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等学者先后在国外教育资料的收集与介绍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 世纪以前,少数杰出人物在教育比较领域里的活动,虽然是可贵的,但又是不自觉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往往囿于发表观感与印象。这诚然为尔后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作了前期的准备,但从整体上讲,并没有形成学科的框架与系统。因此,严格地讲,人们在这一阶段的活动还不能被看作科学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研究,或许可被称为比较教育学的史前时期。

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既有延续性,又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正确地划分阶段有利于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与认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一、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包容整个 19 世纪。

18 世纪下半叶,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随后,在英、法等国家相继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面貌。两大革命的浪潮一方面推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使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一些较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开始致力于结合本国的特点,建立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制度。一些学者亦从改善本国教育的目的出发,开始有意识地考察外国的教育情况。这一切使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

法国的教育家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en, 1775—1848)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与方法,从而标志着正规的比较教育研究开始进入第一阶段。在朱利安于1817年发表的《比较教育的研究概要与初步意见》^①的专著中,率先使用了“比较教育”的概念,阐明了有关比较教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强调了比较的方法。朱利安极力主张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发展对各国教育的研究。为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教育协会,广泛收集有关资料,用最新的方法培训师资,发行用多种语言出版的刊物,以便促进各国广泛交流教育经验。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能够完善各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并能为欧洲国家制定共同的教育政策服务。朱利安的这些建议与主张虽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但由其提出的一系列原则,毕竟还是奠定了比较教育学的基础。因此,他在后来的年代里,曾长期被誉为“比较教育学之父”。

继朱利安之后,法国另一位教育家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 1792—1867)主张以外国教育的范例作为改善法国教育制度的借鉴,从而在比较教育学领域作出了具有推动作用的贡献。当时,普鲁士锐意发展国民教育,成就誉满欧洲。富有历史眼光的法国教育部长基佐(Guizot 1787—1874)为重建法国的学校教育体制派库赞赴普鲁士专门进行教育考察。1831年库赞就其考察的结果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有关普鲁士公立教育状况的报告》^②。报告详尽地介绍了普鲁士学校的课程设置、教育管理、师资培训与工资待遇以及

① *Esquisse et vues pré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éducation comparée* Paris, 1817.

② *Rapport sur l'état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dans la Prusse*

家长责任等问题。报告使用的是描述法,对普鲁士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与评价,强调了其可供借鉴之处。此报告受到了法国政府的重视,在其影响下,法国议会于1833年通过了关于初等教育的基本法,亦称基佐法。库赞的报告被译成不同文字广泛传播,曾对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一些教育家和学者,以学习考察为目的,相互往来频繁,客观上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美国的教育家约翰·格里斯孔(John Griseom 1774—1852)在出访欧洲后于1823年出版了《留欧一年》的专著,介绍并比较了瑞士、荷兰与普鲁士等国的教育。183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了一个8人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收集有关教育情况资料。其首任秘书霍拉斯·曼(Horace Mann 1796—1859)在其于1843年撰写的《第七年报》里,对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荷兰和英格兰的学校组织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 1811—1900)在其创办的《康涅狄格州普通学校》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美国其它州和外国的教育制度以及有关比较教育的资料。

与此同时,英国的不少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其中较著名的有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9—1888)和米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 1861—1943)。前者通过到国外考察欧洲其它国家的教育实际,确信必须对英国教育进行改革。在其于1868年发表的《欧洲大陆的学校与大学》一书中,他对法国、意大利、瑞士、德意志、普鲁士的中、高等教育与改革进行了描述与评价;在其《法国的普及教育》一文中,阿诺德又对法、英两国的教育进行了比较,还对

法属瑞士与荷兰的教育情况予以介绍。总的来看，他特别强调欧洲大陆教育制度的积极之处，主张英国应对此予以借鉴，同时也指出了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时易犯的错误。萨德勒则是一位跨比较教育学发展历史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人物。萨德勒重视教育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国家背景，强调比较教育学的预测功能。他在主持英国特别调查报告局工作期间，在1897至1914年的17年内，先后出版了共28卷的《教育问题专题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描述某些外国的教育经验，并开始分析教育发展的某些趋势。

在明治初年，日本为了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经验，曾派遣岩仓居视和文部大臣田中不二磨等一行赴欧美考察。他们在归国后于明治八年整理并发表了15卷本的《理事功程》，开始较全面地改革日本的教育。

沙皇俄国时代也开始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除邀请朱利安赴俄讲学、派人到西欧考察教育外，教育家康·季·乌申斯基(K. D. Ushinsky 1824—1870)和列·尼·托尔斯泰(L.N. Tolcmou)等人在比较教育学领域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尝试。乌申斯基致力于对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的教育制度、教育实践、教育特征等进行分类，并开展有意识的比较。在承认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他主张把外国教育制度中的积极东西引入俄国的学校实践。托尔斯泰则反对直接借鉴别国的国民教育制度，认为俄国应有适应俄罗斯人民生活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自己的教育制度，从国外的教育中只能借用教育儿童的个别方法和方式。此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俄国的一些教育杂志上，还先后发表了不少介绍和分析外国学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以及外国教育家论文或著作的译文摘要。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比较教育学在这一阶段所呈现的

特点是：注重对外国教育有关资料的收集与积累，侧重对不同国家教育情况的了解与介绍。在目的上，强调借鉴或者利用他国的教育经验改善本国的教育；在手段上，主要是实地考察与访问；在规模上，虽较前有所扩大，但仍缺乏全面的引导与组织；在理论上，虽有所尝试，但还很不断完善与系统；在方法上，虽有所发展，但仍以描述法为主，比较分析的方法并未成为对学者和专家们起主导作用的方法。尽管这一阶段的比较教育研究导致了欧美各国普及、义务、公共教育原则的确立，推进了欧美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但是朱利安提出的通过对资料的联系与比较、提取原理、确定规律的目标并未实现。因此，这一时期只能被看作是比较教育学的形成阶段。

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上系指 20 世纪的前半叶。

20 世纪初，人类社会跨入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生产、科学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教育事业的普遍繁荣与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其内部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与尖锐的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了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继苏联之后又产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世界首次呈现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并长期对峙的局面。

这一时期也暴露了一些国家在教育结构方面的缺陷，显露出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不足之处。教育一方面要受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的制约，另一方面则必须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为此，不少国家开始研究影响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并着手对本国的教育进行改革。新的形势

对各国的比较教育学家们提出了新的任务。于是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推动与渗透下，比较教育学界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向前发展的新势头。

在这一阶段中，前面已经提及的英国教育家萨德勒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萨德勒认为，不能孤立地对教育进行研究，必须联系影响教育发展的各种背景，特别是历史的因素。如果没有对决定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的研究与分析，就无法理解和借鉴外国教育的成功经验。他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艾萨克·康德尔(Isaac Kandel 1881—1965)在继承萨德勒主要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康德尔毕生活跃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舞台上，曾先后发表了《比较教育》、《中等教育史》、《管理类型》、《教育的新时代》、《战争对美国教育的影响》、《20 世纪的美国教育》、《大学的崇拜》等著作。在其著作中，康德尔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的定义、对象和方法，并对英、法、德、意、苏、美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他提倡历史法，认为比较教育学应分类向读者提供各国的教育情况，介绍有关国家教育的事实与特征；认为对一国教育的研究应主要从历史的纵向着手，并结合整个国家的其它背景。研究的目的在于改进本国的教育制度。康德尔的上述主张在一个时期内曾支配了西方比较教育学界。同康德尔的观点基本一致的学者还有罗贝尔·乌利希(Robert Ulich)等人。

英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尼古拉·汉斯(Nicholas Hans 1888—1969)在比较教育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早期，汉斯是英国《教育年鉴》的固定撰稿人，曾在此年鉴中先后发表了《18 世纪耶稣会的解散及其财政后果》、《军

事教育》、《欧洲的新的专业需求》等文章。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苏联天才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俄国教育政策史1701—1917》、《18世纪教育的新趋势》以及名作《比较教育：教育因素与传统的研究》。汉斯一生从事了大量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表现出对教育发展因素的极大关注。他所倡导的因素分析法，对整个比较教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同时期中，德国比较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 1881—1974)和英国比较教育学家凡尔农·马林森(Vernon Mallinson)，也对比较教育学的发展颇有建树。这两位专家在比较教育学方面的观点和方法同汉斯基本相似。施奈德在1947年发表了《各国教育的动力》一书，主张着重分析研究影响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马林森先后发表了《学校中的青少年》、《比利时教育的动力和策略》、《比较教育研究导论》等著作。在其著作中，他虽然重视历史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但更注重其它多种因素对教育的作用。

应当指出，自20世纪初开始，世界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了一个突出的变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陆续加入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行列。列宁在研究了资产阶级教育学、教育政策和学校政策之后，曾强调要正确地、从历史角度阐明教育和教学的民主观点，探讨教育现象与国家历史、经济和文化紧密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列宁的意见，纳·康·克鲁普斯卡娅(Крупская 1869—1939)在十月革命前后，曾深入地研究了法国、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德国以及美国的教育状况，并考察了她曾侨居的一些国家的学校。在其于1915年出版的《国民教育与民主》以及于1916年所写的关于出版《教育辞典》的信件中，她都十分强调

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外国教育的情况,分析别国教育的经验。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虽称不上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的专著,但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对苏联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推动意义。在她的倡议下,一批苏联教育家在20年代和30年代,积极从事研究国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并出版了《外国教育学通报》。其中有P·G·米茹耶夫的《欧洲高中中的问题和美国的对策》(1922年),E·古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教育体制》(1928年)、P·卡冈的《德、奥、法的国民教育体制》(1928年)和《欧美教育中的新体制》(1930年)。

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时期,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有了广泛的开展。这为比较教育学研究活动的活跃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国的教育家们纷纷酝酿并成立了一些区域性和国际性的教育研究机构。根据国际联盟的倡议,1925年在日内瓦建立了国际教育局。该局在收集教育资料、沟通教育机构与团体间的联系、发表专著、发行《国际教育年鉴》、组织学术会议、确定研究课题等方面,均作了许多积极的工作。同时,在欧洲、北美及其它地方,还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学术会议。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学家们利用学术会议、考察旅行、国际会晤等多种形式着手系统深入地研究世界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于1923年成立了国际教育研究所。另外,早在1898年,该校在詹姆斯·拉塞尔博士(Dr. James Russell)的倡议下,就率先开设了比较教育学的课程。此后,世界不少国家的大学和师范学院纷纷仿效,也先后开设了这门课程。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开始建立一批比较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

综上所述,与第一阶段相比比较教育学在其第二阶段有